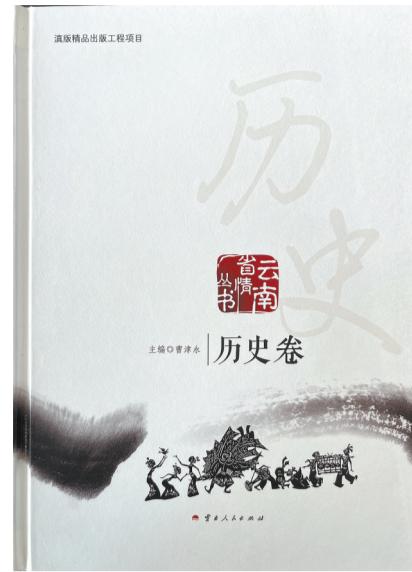


云南文史

以史为鉴，以文传薪。云南的历史，是多民族共生共荣的历史，是多元文化交流互鉴的历史。为了让读者能更深入地了解云南历史的发展脉络和独特价值，读懂这片土地上各族人民坚韧不拔、包容开放的精神内核。我们联合云南省社会科学院历史研究所（文献研究所）对云南历史进行特别策划，运用新的历史发展主线、叙事模式，力求展示好真实立体的云南。



# 云南历史发展的主要脉络和特点

基于《云南省情丛书——历史卷》的认识

曹津永

# 从永昌郡城到永昌府城

保山历史古城的变迁  
蒋开翥

不吉昌治

保山历史悠久，文化积淀厚重，是云南历史上开发较早的地区之一。保山历史上曾是哀牢国首邑，西汉时设不韦县、东汉时设永昌郡、南诏大理国时期设永昌节度、元代设大理金齿宣慰司都元帅府、明清以来设永昌府，保山历史古城的变迁，全程见证了滇西地区在不同历史阶段的繁荣与沉浮，见证了保山各民族在不同时期的交流与文化融合。

永昌郡治

关于永昌郡设治，《后汉书·西南夷列传》载：东汉“永平十二年（69年），哀牢王柳貌遣子率种人内属，其称王者十七人，户五万一千八百九十，口五十五万三千七百一十一。西去洛阳七千里，显宗以其地置哀牢、博南二县，割益州西部都尉所领嶲唐、不韦、比苏、叶榆、邪龙、云南六县，合为八县，置永昌郡”。又据《续汉书·郡国志》载：当时，永昌郡八县共有20多万户，人口189万多人，在东汉105个郡国中为第二大郡。而其疆域则“东西三千里，南北四千六百里”，即从今约大理一带向西抵腾冲、德宏一带，向南直达临沧、普洱、版纳等地区。史载：“孝章帝建初元年（76年）……蛮夷陈纵等及哀牢王类牢反，攻嶲唐城，永昌太守王寻奔叶榆。”“次年（77年）汉朝讨平之，郡徙治不韦。”由此得出结论，永昌郡于章帝建初二年（公元77年）迁郡治至不韦（今保山坝），并建郡城于今保山城南四公里处诸葛营村东侧，此址直至晋代还一直沿用。永昌郡治设在不韦县共计222年，元康九年（299年），吕凯之裔吕祥之子为永昌郡太守时，“值南夷作乱，

000米处，现为保山市隆阳区汉营社区，该城址始建于

闽、濮反”，郡治“乃南移永寿(今耿马)”。其后又设治于永寿县(今耿马)43年，整个郡治史共计265年。

今保山市城南的汉营古城址为国家级文保单位，其坐落于保山市隆阳区兰城街道南端3000米处，现为保山市隆阳区兰城办事处汉营社区，该城址始建于东汉（公元25~220年）时期，遗址为城墙旧址，即以今之所见的四周高坎田埂为标志，东西长365米，南北宽310米，呈四方形，占地为11.32万平方米，城西有外廊，并有大量汉晋时期的几何纹砖、布纹瓦、卷云纹瓦等遗物出土。如出土“建安四年造作”（东汉末期公元199年）；“延熙十六年七月十七日亡”（三国蜀汉末期公元253年）；“元康四年造作”（西晋初期公元294年）；“□□二年造”“长乐寿未央”和“五铢”“羊羊”等铭纹砖。其中分布最广的是瓦砾，有的堆积层厚达50—100厘米。这些板瓦为三分瓦，有的长达46厘米，宽37厘米，厚2厘米。筒瓦则为二分瓦，有的长达40厘米，直径宽15厘米，厚2厘米。筒瓦有搭榫，子口直径约4厘米。从这些出土的砖瓦纪念文字和图案考察来看，这一古城在当时应该是一座辉煌的边地古城。2001年，国务院将其公布为重点文物保护单位。

永昌府治

自唐南诏时期起，保山地区的行政中心从原永昌郡城址迁至地势更高的太

城成为国际性的都市，吸引着商人、僧侣和使节。大理国将佛教推向高潮，使云南成为中国与佛教文化交流的重要中转站。元修建连接省内各地并通往四缅甸站赤、驿道网络，明朝在境外广设土司机构，其政治影响辐射大部、泰国北部、老挝北部等地区，形成了著名的“贡象道”，逐渐演变为云南重要的出海贸易通道。尽管云南的对外贸易格局发生变化，滇缅贸易急速发展、日益昌盛，普洱茶通过茶马古道销往中南半岛、伯尔、印度，并进入俄罗斯和欧洲，仍然在全球白银贸易中扮演重要角色。云南的蒙自、腾冲等城镇成为贸易的重要口岸，出现了“商贾云集”的繁荣景象。云南从区域性贸易节点，转变为全国性乃至全球性贸易节点。

与环境的互动从局部适配逐步走向系统性干预。坝区逐渐成为人类活动集中的区域，铁质农具的开发及中原耕作技术的传入，使得坝区的耕作强度不断增大。山区由“虎狼”居住之地，逐渐开发出梯田和台地，矿产资源开采逐渐增加并走向规模化，对区域环境形成了一定程度的扰动，稻麦复种制得以形成并推广，复合型农业生态系统初现雏形，有效维护了农业生态的稳定。元明清时期，大量移民进入，伴随着坝区人口激增，农业开发的强度和广度都在大大拓展。改土归流的推进，导致传统稳定的山坝分异发展模式被打破，移民开发及先进农耕技术进入山区，带来了山区空前的环境压力，马铃薯、玉米等美洲作物的引进，打破了南方山区的生态平衡，水土流失成为局部生态失衡的重要表征。同时，自元代开始至清代，中央王朝在云南的矿产资源包括铜矿、银矿、锡矿等规模化开采日渐

以来，云南的对外开放经历了从受到主动拓展的历程。中法战争后，河口等地被迫开埠，1910年滇越铁路不仅推动了沿线城镇的建设，使其成为输入西方技术、制度的重要通道。抗战时期，滇缅公路“一线”更将云南提升为连接中国与反法西斯阵营的战略枢纽。新中国成立后，云南的开放被赋予新内涵。从沿边开放到“面向南亚东南亚中心”定位，云南正从开放“末端前沿”。中老铁路通车、中缅经济走廊、中国—南亚博览会落户昆明，共同推动云南形成陆海联动、互济的开放新格局。

发展，逐渐引发新环境问题，带来新的挑战，清代滇东北铜矿业中，当地森林覆盖率下降20%，且矿业开发使当地聚集大量人口，为了生产生活毁林开荒，垦殖农田，使滇东北很快从一个人口稀少的较少开发地区，成为云南人口密度较高、环境破坏和水土流失最严重的地区，也成为清代中叶以来长江上游输沙量的主要来源地区之一。与此同时，云南多民族“大杂居、小聚居”格局基本成型，各民族融合儒家思想与实践智慧，形成了与自然环境高度适应的生态文化体系，在生态文化体系上形成了传统与现代并存的新局面。

的历史发展始终贯穿着联通内外特征，这一特征不仅塑造了云文化身份，也使其在中国与东盟乃至全球的交往中发挥着不纽带作用。

系发生显著变化。大规模开发与战乱给生态环境带来严峻挑战，橡胶、烟草等经济作物的引种也对传统生态平衡形成冲击。与此同时，西方现代生态知识与农业技术传入云南，推动生态观念与治理方

人与自然和谐共生是云南的重要底色

因地理位置、巨大高差及两大向，形成立体气候与多样生境，带到高山冰缘、从湿润到干旱生态系统，堪称地球生态系统的植物种类丰富度、特有率及古生物多样性高地。

技术传入云南，推动生态观念与治理方式发生转变。农业领域引入灾害防治与综合治理技术；城市方面，政府以“园林都市”理念规划昆明，并出台《云南森林章程》等系列林业管理制度，以国家主导的现代管理模式积极干预生态保护，对人与自然和谐共生进行积极干预。

经过数千年的历史变迁，云南各民族善于顺应天时应时，敬畏自然，合理利用等。

植物种类丰富度、特有率及占全国前列。独特的地理气候使历史上各民族迁徙、交融的通适应和利用自然的过程中,各积累了丰富生态智慧,始终追求的协调平衡,绿色发展成为云重要底色。

先民从采集野生植物逐步发展畜牧结合的农业形态。新石器随着物种与驯化技术的传入,与动物饲养体系趋于成熟,植具观赏与药用功能,家畜以狗、池地区碳化稻谷遗存表明,青

族基于顺天应时、敬畏自然、合理利用等生存理念与智慧,形成了千姿百态的适应环境的生计模式,并由此衍化为具有民族性、地域性和独特性的民族生态文化。这是云南成为西南生态安全屏障核心区的历史积淀。这些丰富多彩的民族生态文化是促进中华民族与自然和谐共生的重要思想宝库,为云南生态文明建设打下了深厚的历史根基,有利于推动云南形成文化多样性与生态多样性高度耦合的人与自然和谐之道,从而成为生态文明建设中人与自然和谐共生的实践样板。

[作者系云南省社会科学院历史研究所(文献研究所)所长、研究员;文中多有参考引用方国瑜、马曜、尤中、林超民、何耀华等诸位先生的观点,由于报刊文章体例所限,无法一一注明,在此一并致谢!]

### 三国至唐宋时期，云南的人类活动



诏王皮逻阁于天宝二年(743)筑土城,称为拓榆城。其后历设永昌节度/府)、元代(设永明清(设永昌府),此处始终为重心。  
四年,原坏检讨以因口其重修

初年，原拓榆城址因旧基重修，现在其旧址上支砌的砖石，增于城西太保山上分设“子城”洪武二十八年(1395年)都指再度扩建，并仿南京包钟山之与主城连为一体，纳太保山于料记载，当时的永昌城，城墙又14步。“凡八门，东曰升阳·

又14步，“凡八门，东曰升阳；南曰中和；西曰安定、永镇；北曰玄武、拱北”。城周各设角楼、炮楼、箭楼等。墙外有护壕，以吊桥沟通内外。一座规模宏大、设施完备的砖石城终于形成。坊间尚有传闻说，当年永昌府知府王璋在西山地偏坡上的城墙屡建功勋，被封为侯爵。王璋的马夫、当时的永昌都指挥使洪亮，上书洪武皇帝，请求指点，图纸上指点勾画之后，此城乃得建成。一段城墙便有了一个极为洪亮的别称——“洪亮笔轩”。

(作者单位:中共保山市委宣传部)